

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沒落

——以《原道》和陳明為例

◎ 王 忠

陸陸續續看過各輯陳明主編的《原道》，感覺這個刊物還是比較有個性的，主要是文化保守主義的色彩很濃吧。聽說，這個刊物是以「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大旗」相自許的；也聽說，陳明本人非常有個性，似乎還受到過甚麼打壓，挺不容易的。不管怎麼說，一個不為流俗遮蔽而能保持一貫立場的刊物和一個有鮮明個性的人，已經努力堅持了十周年，我還是很願意向《原道》和陳明道聲祝賀的。

祝賀歸祝賀，然而，如果說《原道》真的是「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大旗」的話，或者說，如果《原道》的一些文章和觀點真的代表了當下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思考和探索前沿的話，恐怕是，這僅僅是我個人的看法，這個刊物不會走得太遠，即使再勉力支撐十年，也不過是「文化保守主義」的姿態性存在而已。我之所以這樣說，是感覺《原道》連幾個前提性的，甚至是簡單的理論問題，似乎都沒有搞清楚：

第一，《原道》輯刊和陳明本人，奮力呼籲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其出發點是立足於中國「歷史的一貫性」和「思想的內在性」。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這個訴求無論哪派似乎都不會有人反對，但把中國「歷史的一貫性」和「思想的內在性」作為這種重建的出發點，恐怕站不住腳。一個族群，若要建立文化的主體性，而且追求這個主體性「合情合理合法」和「可欲可信可行」的話，其出發點只能是個人主體性的萌發和自覺，使社會的每一份子都有獨立思考、選擇和抗拒的權利，而不受任何外來的思想和權力的強行規制。一味強調族群的主體性，將會使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喪失「合情合理合法」和「可欲可信可行」的基礎——誰能說希特勒的法西斯文化沒有族群的主體性呢？而中國「歷史的一貫性」和「思想的內在性」，缺乏的正是這種個人主體性的萌發和自覺，否則它就不會在近現代中國喪失合法性而狼狽逃竄，乃至銷聲匿跡。

第二，《原道》輯刊和陳明本人，試圖用「文化保守主義」應對「現代性」的語境，也試圖用「文化民族主義」應對「全球化」的場景。實際上，不管搞的是甚麼「主義」，基本上都是「中體西用」的套路。問題是，民族利益的主體性並不等於傳統文化的主體性，更不等於它的合法性；中國的問題，不僅僅是個博弈的規則問題，更主要的是規則的博弈問題，也就是「體」的問題。儒家的內聖開不出新外王，不是它的反對者的一面之詞，而是歷史的證實。人們有理由追問，這個本身缺乏現代性的文化傳統如何有效應對現代性呢？如何能以「體」安然自居，而且要把自己作為衡量各種文化思潮的維度呢？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自由和憲政是可欲可信可行和合情合理合法的話，為甚麼不能把自由和憲政等思想作為文化之「體」，而後「熔鑄新傳統，建設新文化」呢？為甚麼中國的文化建設就非得沿著老套路和

舊軌道運行呢？

第三，《原道》輯刊和陳明本人，想當然地把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的訴求歸結為政治領域的制度設計，而認為儒學是一個包含有政治、社會和人生等方方面面的大而全的系統，因此儒學能整合前兩者。這點似乎不但是如上所述的一相情願，而且有些坐而論道了。暫且不說歷史上激進主義成功的社會，都建立了一個大而全的社會和文化系統，就拿自由主義來看，也是不但關涉政治、經濟和文化，而且關涉國家、社會和個人的。舉個簡單的例子，自由主義的發軔和成長，與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的興起，有著絕大的關係，甚至可以說，自由主義和現代經濟是一體之兩面。自由主義對現代經濟的設計和執行，已經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儒家文化一向在現代經濟領域建樹頗少，只能以道德的高標來論衡現代經濟的得失，只會批判，而不能建設的。試問，這樣的儒家文化如何能整合這樣的自由主義呢？難道是僅僅一句「我吸收你而後把你作為我的『用』」就能了結得了的事情嗎？

對於上述幾個問題，《原道》和陳明，多是避而不談的。避開這些問題後，他們談論更多的就只能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立場、態度、責任和信心了。而這就如同一個人身上背著一個包袱，不管包袱裏裝的是甚麼東西，這個東西有沒有價值，《原道》和陳明都告訴這個人，繼續走吧，希望還是有的，而毫不顧及背這個包袱的人還能走多遠，還能堅持多久？

而人們也難免會問一問：《原道》和陳明，你到底還能走多遠，還能堅持多久？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六期 2004年5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六期（2004年5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